

蔡元培为
《无线电杂志》题词



蔡元培为
《新民》杂志题词

护的北京大学，蔡元培生前也十分关注联大。在香港期间，他频繁地与在联大的北大同人保持着联系和互动。在他支持下，中研院史语所在人力和学术资源等方面都给了联大和北大尽可能多的支持，帮助战火中的学府渡过了不少难关。在学校的盛

邀之下，一口气为三校及联大书写校训，更是他情牵联大、爱护联大的具体体现。1939年，先生的女儿、联大教授林文铮夫人、国立艺专教授蔡威廉在昆明逝世，联大同人为了纪念她，筹办了盛大的画作展览会。1940年，蔡先生也在香港安然走完一生。3月10日，联大师生千余人在新校舍举行公祭，由蒋梦麟主祭并报告了其生平，并由梅贻琦致辞。24日，梅贻琦又参加了云南各界在昆明举办的盛大追悼会。在龙云致祭文后，梅贻琦报告了蔡先生的生平，赞誉其为“近代之师表”。

时光不败经典。联大在五色交辉的绝好氛围下产生的“刚毅坚卓”校训，也正因有了蔡先生的倾情书写，而愈显出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这必将在我国文化教育史上写下一段不朽的佳话。

早期南京清华同学会那些人那些事

○袁帆（1975级建工）

南京是一个历史大舞台。在这个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舞台上，近百年来清华人也曾演绎出难以计数的事迹，值得推崇的当然首先是：吕彦直设计中山陵、余青松创建天文台、陈三才血洒雨花台、梅贻春督建长江大桥……但其实更加丰富的各类故事都能给后人以无限的回味、启迪、警示，只是取决于视角和深度如何。

清华同学会于1913年6月29日在母校成立。1915年，在美国成立清华学校留美同学会总会。以后随着毕业回国者逐渐增多，故于1920年12月5日在北京开会，“讨论设立清华同学会支会事，并拟定设支会于北京、南京、上海等处，俟支会成立

后，改设总会于北京，以现实美国总会为支会”。以这次会议为起点，南京清华同学会应运而生，成为第四个成立的国内分会。

南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特别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南京又一次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枢之地，从各个方面对当代中国历史发生的影响都不容忽视。有鉴于此，追踪清华南京同学会的历史足迹，也成为研究清华同学会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南京清华同学会发展脉络

从现有史料可以确认，北京（华北）支会是最早的国内清华同学会组织，随

□ 史料一页

后清华上海同学会于1921年成立，南京清华同学会最早成立的时间则可以追溯到1923年。

1923年11月4日（星期日），当时南京清华同学在夫子庙的万全酒馆聚会，讨论成立同学会事宜。出席人数约有15人左右，而且都是1909年至1918年之间赴美留学的最早几批毕业生，其中有1909年第一批47位庚款留美生中的三人：秉志（1886—1965）、胡刚复（1892—1966）、王璉（1888—1966）。

会上选出1916级的朱斌魁（1895—1963）为首任会长，担任书记的程其保（1895—1975）是1918级。当时，这五位清华同学都是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其他会员基本上也都在为东南大学等几所大学服务。

东南大学1921年成立于南京，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1925年初，因北洋政府任命胡敦复（1886—1978）为校长，因故激起学生反对而酿成“东大风潮”。因为这一事件，会长朱斌魁（字君毅）离校北上去清华任教，书记程其保去上海大同大学任教，其他几位会员也离开南京，这就影响到人数本来不多的南京同学会，致使会务停顿。

一直到1927年北伐战争结束，国民政府宣布“定都南京”。12月4日，南京清华同学会重组，选举陈鹤琴（1892—1982）为会长，出席这次重组活动的有19位清华同学，从此会务活动重新启动。

1933年，清华同学总会从美国迁回国内，选举出以梅贻琦校长为首的董事会，会所正式落地北平骑河楼39号。这一年6月1日，南京同学会再次改组，会长是1920级的杜庭修（1895—？）、书记是1924级胡竞铭（1904—1989）、会计是



先后担任过会长的陈鹤琴（左）、朱斌魁（右）

1920级杨荫溥（1898—1966）。参加此次重组聚会的同学已达80余人，“各界均有，武装同志约有六、七位”，说明当时在南京的清华同学的人数较10年前已经明显增多。

在1935年7月的清华同学总会与分会一览表中，可以发现会长已经改为1924级的胡竞铭（1904—1989）。两年之后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8月14日南京首次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至12月13日，南京陷落于敌手。国民政府迁都到重庆，清华南京同学会因战争而不复存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南京清华同学会在抗战胜利之后重新恢复活动，据相关史料可知，“清华大学南京同学会”于1947年4月正式注册登记，会长是1921级的浦薛凤（1900—1997），会址设在南京中山东路聚兴诚银行。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新时代开始。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清华同学会”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先后停止活动并解散。直到30余年后，清华校友总会重新成立，1983年4月23

日，南京校友会恢复活动。

早期南京同学会的那些人和事

作为民国首都，1949年以前的南京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科学中心，大批各界人才集中之地。南京清华同学会中自然也是人才济济，群星闪耀，许多杰出校友都曾在南京留下不同凡响的事迹。

（一）见证南京同学会历史的孙立人佚作

孙立人（1900—1990）是清华学校1923级毕业生，他在清华学校学习生活9年，对清华感情极深，有“生我者父母，树我者清华”的名言。他也是那个时期清华的体育健将，知名度很高。他毕业留美先学习土木建筑专业，再学习军事，立志从军报国。

三年前，在一次网上拍卖会中，出现了一件《圣教序》拓片，上有藏主所题的一首诗与一段感言，识录如下：

藻栋茜樑萍浮逢
赵李欢呼称弟兄
搁管扪心思往事
瀛梦五年几断肠

聚集百数同学一堂，文德相会，各以长短相助，宜乎有所造诣。于今五年，一无所得，问心有愧，故书数语洩怀。

一九三三八十七立人识

当时卖家也没有对这首诗的背景作出更多说明，只推测说是当年“孙立人”的收藏。根据落款“立人”两字的笔迹来看，与以往见到的孙立人将军笔迹并无差别，但仅此一点还不足以判断这件拍品的真伪，因为现在伪造名人笔迹以图谋利者大有人在，造假水平几可乱真。倒是这首诗和感言所包含的信息十分重要，虽然乍

一看让人不明就里，但却明显可以看出其中的核心逻辑，是作者在某次同学聚会中触景生情，联想到自己“于今五年”“一无所得，问心有愧”，于是写下“数语洩怀”。

基于这样的判断，只要能在清华历史上找到发生在这个时间段的相似事件，再证明孙立人有无与事件交集的可能性，就基本可以判别其真伪。于是我将“聚集百数同学一堂”当作事件的焦点，将其假设为一次清华同学集会，再围绕落款的时间点进行了多方面的资料查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933年6月12日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中真的找到一则关键信息，那是清华同学会干事徐雄飞发自南京的通讯，称“六月一日该地同学会假中央饭店举行聚餐，到校友八十余人，各界均有，武装同志约有六、七位。徐君被邀列席，请报告筹委会筹备总会详细经过情形。此间校友对于该项问题，颇属关怀”。

至于内中所说参会的“武装同志”，可以理解为是具有军人身份的校友，但没有给出具体名单。当时南京作为民国的首都，也是高级军事机关集中的城市，历届清华毕业生服务其中的约有十几位。根据1933年《清华同学录》记载，包括：王赓（第三批庚款留美生）、王成志（1916级专科）、杜庭修（1920级）、李耀慈（1920级）、朱世明（1922级）、孙立人（1923级），王棱（1925级）、姚楷（1925级）、王之（1926级）、李忍涛（1926级）、邢必信（1930级）等人。

彼时的孙立人正在财政部“税警总团”担任特种兵团的团长，因此作为“武装同志”参加此次同学会活动顺理成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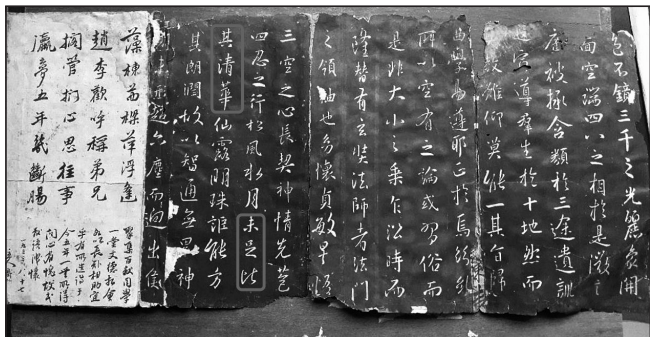
□ 史料一页

诗中“藻栋茜樑萍浮蓬，赵李欢呼称弟兄”这两句，其实就是形象地描写了聚会时清华同学久别重逢，彼此称兄道弟的热闹场景。而“聚集百数同学一堂，文德相会，各以长短相助，宜乎有所造诣”则是对聚会情况的进一步补充，其中所说的人数与徐雄飞报道中所说的人数也基本一致，如果不是身临其境，编造出如此有逻辑性的故事简直就是“神话”。

而对作者两次提到“五年”的概念，也和孙立人的经历高度相似。事实上，孙立人从1928年学成归国，至1933年恰为“五年”。从大量孙立人传记中可知，在这五年中，他因为不是“黄埔系”出身，因此在国民党军队中始终没有找到让他发挥才干的机会，郁郁不得志，于是生出“一无所得，问心有愧”的感慨确系事出有因。

经过这样的分析与推理，可以认为这件《圣教序》拓片上的题诗和感言确为孙立人的佚作。至于他为何在聚会两个月后才写出心中的感慨，这个可能与他在这个时间点观赏这件碑帖有关，而碑帖中的一句“未足比其清华”则可能就是触发他宣泄情绪（洩怀）的关键词。

由此，完全可以认为，这件佚作既是



由“立人”题诗的《圣教序》拓片，有“未足比其清华”句

孙立人研究的重要史料，也是南京同学会历史片段的一个见证，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二）余青松创建紫金山天文台

在早期南京同学会中不乏享誉中外的科学精英。1937年以前在南京同学会中就有几位著名的科学家，他们是竺可桢（第二批庚款留美生）、余青松（1918级）、张钰哲（1923级）。其中，竺可桢（1890—1974）当时是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余青松（1897—1978）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张钰哲（1902—1986）是中央大学教授兼天文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相对于竺可桢与张钰哲，余青松在当下的中国科学界知名度并不高，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中国科学史上的影响与地位。

余青松，1897年4月9日出生在福建的官宦之家，1918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在里海（Lehigh）、加利福尼亚、匹兹堡等三所大学攻读土木工程、数学、天文学，最终获得哲学和天文学博士学位。1926年，由余青松创立的“恒星光谱分类法”被国际天文学会正式命名为“余青松法”，他也因此成为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吸收的第一位中国籍会员。

1927年余青松学成归国，任教于厦门大学。而就在这年11月20日，在南京举行“筹备国立中央研究院大会”，其中一项主要内容是通过由中国近现代天文学先驱高鲁（1877—1947）“在紫金山建立天文台”的提案。余青松的天文学



青年时代的余青松

术造诣受到高鲁的充分肯定，于是后者在1929年4月将自己担任的中研院天文所所长一职交由余青松接任，从此开始其拓展中国现代天文事业、创建紫金山天文台的艰苦历程，当时他只有32岁。

余青松是一位具有扎实土木工程学基础的天文学家，再加上“行胜于言”的清华本色加持，使得他在紫金山天文台的选址、筑路、建造过程中始终亲力亲为，遇山开山，见险排险，不让任何外界因素干扰其建好紫金山天文台、“重振中国天文学事业”的决心。

由于天文台所在区域为紫金山“总理陵寝”要地，因此在选址、修路等多个基础环节受到的阻力与限制较多。而且在长达五年的建台过程中，中日战争的升级，国内政局变化也不断影响着工程进度。余青松就是在十分艰难的外部环境下，不仅要处理工程上的每一个具体问题，而且要在变化莫测的政治环境中争取经费，左右周旋，艰难推进。

1931年5月底，解决一切先行问题后，天文台终于在紫金山第三峰破土动工。但之后的东北“九一八”事变，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以及国内政局激变

又迫使工程一次次受阻停顿。面对困局，余青松在1932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坚定表示：“绝不能退却！正因为现在民族危难，国事多秋，此台就更需要吾辈拼力去建……如能力争早日建成，那仅在心理上对唤起一些人团结抗日的信心，我想就会有振聋发聩之效！”

凭借“科学救国”的决心，在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之后，余青松与他的团队终于在1934年建起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天文研究基地——紫金山天文台。后来在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在昆明建起了凤凰山天文台。余青松和他的名字一样，如“青松”般挺立，令后人敬仰。

余青松的事迹深深感动了国际天文界。1989年，哈佛大学天文台将该台于1987年发现的一颗国际编号3797的小行星冠名为“余青松星”。

而先后被命名的“张钰哲星”和“竺可桢星”，与“余青松星”一起，不仅成为早期南京清华同学会值得骄傲的三颗“明星”，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国际科学界对清华“自强不息”精神的尊重。

（三）1947年南京同学会的一笔捐款

抗战胜利后，南京再次成为清华校友集聚的主要城市。1947年4月清华同学会完成注册登记，重新开始组织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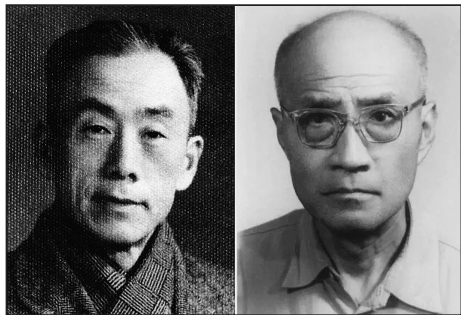
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1921级）和童寓（1925级）也是在这个阶段随中央大学从重庆复员到南京，成为南京清华同学会的会员。根据他们的回忆，当时同学会没有自己的固定会所，活动多有不便。于是一位老同学捐献了一块地皮作为建筑会所之用，但建筑经费并无着落。经同学会开会决议向会员募捐，准备建一幢小楼，并

□ 史料一页

拟冠名为“寄梅楼”，以向清华学校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周诒春（字寄梅）致敬。

自1947年起南京同学会陆续募集到一部分资金，并开始着手进行建筑设计。不过还没等到捐款达到足够的建筑费用时，就遇到政局突变，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建造会所的计划最终落空。幸好当时负责保管捐款的1919级校友钱昌祚（1901—1988）系“国防部”高官，得以随时把捐款换成黄金美钞，既便于保管，又保存了币值。1948年底钱昌祚奉调离宁赴台。临行前他把所存黄金30.97两、美钞293元移交给在银行任职的1926级曹曾禄（字天受）保管。曹天受将原款随即存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南京分行的保管库内。其时，时局动荡，人心涣散，募捐工作也告中止。

新中国成立后，南京清华同学会停止活动。曹天受不久因工作调动离开南京，这笔金钞也就被搁置数十年未及处理。1953年曹天受曾专程赴南京与杨廷宝、童寓商



建筑大师杨廷宝（左）童寓（右）

量捐款处理办法。当时周诒春老校长闲居北京，他们曾经拟议将捐款直接献赠老校长为寿，因其谦辞而作罢。

当时，前南京清华同学会会务已停顿数年，不可能召开会员大会。于是杨、童、曹三位知情的老校友通过信函研究，决定将所存金钞换成人民币捐赠母校清华。但新中国成立后清华所需经费统由国家拨款，他们也不知道母校是否能够接受校友捐款。于是他们事前联系了著名社会活动家、清华教授张奚若（1889—1973）先生，请他向蒋南翔校长提出拟将捐款移赠母校的意见，得到蒋校长的同意。童寓随即将金钞在南京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3473.90元汇交母校接收。前南京清华同学会筹建会所的这笔捐款，终于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1955年7月23日，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收到老学长童寓代表前南京清华同学会汇给母校的捐款计人民币3400余元，时任校长蒋南翔曾复函致谢。

1981年，清华校友总会恢复活动后，杨廷宝、童寓、曹天受三位老学长认为，虽然事情已经过去30余年，但这笔捐款的由来以及汇赠母校的始末，有必要向前南京清华同学会留宁校友和散处国内外的老

一笔捐款

—追记前南京清华同学会筹建会所经过

杨廷宝（1921）童寓（1925）曹天受（1930）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收到老同学童寓代表前南京清华同学会汇母校一笔捐款计人民币三千余元，由蒋校长复函致谢。由于事隔多年，校方会计单据现已不全，童寓所收信函收据也已散失，人民币确数难于查明。这笔捐款的由来以及汇赠母校的始末，我们比较了解原委，有必要向前南京清华同学会留宁校友和散处国内外的老同学，特别是捐过款的同学作一汇报。同时我们深切怀念远在国外的钱昌淦老学长。他是原捐款保管人，一定关心捐款如何处理。如果钱先生能得知当年这笔捐款已汇赠母校，想来也会同意并引以为慰的。

抗战胜利后，南京清华同学尚无自有会所。当时有一位老同学捐献一块地皮作为建筑会址之用，但建筑费没有着落。嗣经集会决议向校友募捐，准备建一小楼拟命名为寄梅楼，向老校长周诒春先生致敬。自一九四七年起募集到一些捐款，开始建筑设计，不过还远没达到足够的建筑费用。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筹建会所的计划终于落空。幸好钱先生

· 109 ·

杨廷宝等在《清华校友通讯》上刊登的文章

同学，特别是捐过款的同学作一汇报。于是他们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一笔捐款》，登载于《清华校友通讯》（复4期），追忆了早期南京清华同学会捐款筹建会所的这段历史。

他们之所以要把这一段往事扼要追记，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就是希望前南京清华同学会会员（不管后来身在何处）对30年前的旧事得以了解始末。他们特别希望这笔捐款的最初保管人，当时已经移居美国的钱昌祚老学长（1901—1988）（《一笔捐款》文中，作者认为钱昌祚笔误为钱昌淦，考证文章见本期第56页）能够知道捐款已经转赠母校。其时钱老学长仍健在，想必在他知道这一情况后，一定会因捐款得到妥善处理而感到欣慰。

从1947年南京同学会募集捐款建校友会所，到1955年把捐款转赠给母校，其间经历了整整8年。据了解，这笔捐款最初虽然不是直接捐赠给母校，但事实上已经成为1949年以后清华收到的第一笔校友捐款。这段佳话也可被认为是早期南京清华同学会留在清华校友会历史上的永久纪念。

早期清华同学总会准备迁移到南京

在清华同学会的历史上，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那就是设在北平（京）的总会曾经准备迁移到南京。

1913年6月，清华同学会在清华园成立后，起初总部设在美国，国内只设支部（分会）。这种局面前后持续了20年才得以改变。在1933年10月29日，清华同学会董事会正式成立，并在北平骑河楼39号建造了会所。这些举措都是总会正式从海外迁回国内的标志。

1936年9月28日，第二届董事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地点在中山东路165号皇后饭店。出席会议的包括梅贻琦会长等8位董事，代表了15位董事。会议共有五项议案，除了重新选举总会会长、总干事等职员外，另一项重要议案就是“总会移设首都案”。

按照同学会章程，总会应设在母校清华，但提出这项议案等理由是，“兹以多数会员均在京沪，董事亦以服务于京沪占多数”。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同时“拟以董事会名义，向会员建议，移总会于首都，并于最近期间以通讯方式表决”。这里的“京沪”即指南京与上海，当时南京是“首都”，上海是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多数会员和董事都在这两座城市工作生活，所以董事会提出迁移总会至南京的提案。

此次董事会结束后，即向各地的全体会员发出投票表决征询，至11月30日，共计收回426票，其中赞成367票、反对46票、中立13票。该议案顺利通过。

既然该项议案在当时已经得到大多数会员通过，接下去就是如何实施的问题了。但后来的局势变化之迅速，完全出乎人们预料。半年以后，诸多有关事宜还未等具体展开，“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这一迁移总会到南京的计划自然化为泡影。

结语

早期南京清华同学会距离我们已经超过70年，即使重建南京清华校友会后也已经40余年。然而，在南京发生的所有清华往事并未随风散去，只要有心，寻踪之旅随时就在脚下，五彩缤纷的历史拼图仍然可以不断得以还原。